产业链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组织化机制研究*

胡卫卫[1]，刘　攀[1]，赵敏娟[2]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黄河流域乡村振兴研究与评估中心，陕西　杨凌　712100；
2.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得传统党建方式难以满足当前乡村产业发展需要。产业链党建是以“组织链”串联起“资源链”“供需链”“服务链”，构建一体化联动服务产业发展体系，推动党建工作与产业链发展深度融合、互融互促的一种新型功能型党组织建设。依据“政党—国家—社会”的三元互动范式，基于我国中央顶层设计和地方实践创新，尝试构建“嵌入—吸纳—协商”的三元分析框架。采取个案分析法，从党组织嵌入、行政吸纳、民主协商三个层面出发，深入剖析产业链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运行机制，具体表现为：党组织嵌入以构建“党建链”引领“产业链”、行政吸纳以整合多方资源，推动产业升级、民主协商以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各方权益。以协同治理为切入点，从组织嵌入以搭建连接上下游的“产业融合桥”、组织吸纳以打造汇聚各方力量的“资源赋能站”、组织协商以编织串联多主体的“利益联结链”三方面，系统阐释产业链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组织化机制。

关键词：产业链党建；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乡村产业振兴

中图分类号：F304；F3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189(2025)05-0117-14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成为破解我国“三农”发展困境、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的顶层框架，并确立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活富裕是根本。如何通过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为乡村持续提供经济增长动力，进而促进农民就业增收成为时下乡村发展不可回避之问。随着我国城乡二元体制逐渐瓦解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乡村富民产业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和深远影响，它不仅能够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提升其生活水平，还能带动整个县域经济繁荣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指明了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和经济提升的新方向和新路径。依托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可以激励农民积极投身产业发展，实现本地就业，享受由此带来的资产性收益。总体来看，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是现阶段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急切诉求，更是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助力迈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学者聚焦我国乡村富民产业相关实践与理论展开研

*项目来源：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一般项目(2025YB0362)；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24F006)。

作者简介：胡卫卫，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乡村治理。

通信作者：赵敏娟，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林经济管理与环境经济学。

究，包括阐述乡村富民产业内涵、特征（王国峰和邓祥征，2020；黄少容和林革，2024），分析其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成效（庄天慧等，2024），揭示其发展过程中存在困境并提出相应策略（刘明月等，2021；胡高强和孙菲，2021）。此外，部分学者归纳出发达国家的产业富民经验，例如美国“乡村发展计划”强调联邦政府采取财政补贴、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培训等多元化手段提升乡村地区整体经济活力，着重体现系统性政策支持、资源投入对乡村产业基础的重要性（Marshall，2001）；韩国“新村运动”是在强有力的政府动员和社区参与下，激发农民内生动力改善生产生活环境并发展特色产业，凸显政府引导与农民主体性相结合的模式价值（Evans，1995）；日本通过深度挖掘农业多功能性，鼓励农业生产者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其精髓在于推动产业链深度融合与价值增值，进而实现“第六次产业化”（曹斌，2018）。以上研究均为我国推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及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目标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然而，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以特色农业发展激发乡村产业活力，从而实现乡村产业兴旺是亟待关注的学术话题。

当前，以“党建引领制度”为核心推进乡村产业发展是党推进“三农”工作的重要举措（王惠林和张卫国，2023）。随着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和资源投入持续强化，全国各地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新路径，构建出“党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叙事框架（张雨薇，2023），形成包括“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和“派优派强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在内的领导体系，并依据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发展“一县一业”“一镇一特”“一村一品”等产业布局（曾薇，2023）。然而，仍存在资源未能有效共享（杨学成和梁玉春，2023）、产业间联动不足（肖卫东，2023）、企业合作不紧密（王春光和单丽卿，2018）等问题，破除这些阻碍是当前特色产业发展中亟待实施的关键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并强调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发展优势。因此，推动“以党建引领发展、以发展强化党建”的良性互动，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融入产业链、供应链及价值链持续升级进程，能够更有效整合资源、优化结构和提升整体竞争力。当前，产业链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态势正在逐步显现，学界关于产业链党建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理论层面，有学者从机制与模式研究出发，对产业链党建理念进行剖析（何得桂和刘翀，2022；魏飞，2023），强调产业链党建在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促进要素协同和优化组织体系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同时，有学者运用社会互构论深入分析产业链党建的实践路径与效果，为产业链党建相关研究提供新理论视角（高雪莲，2023）。实践层面，针对产业链条不完善、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及企业间协作配套能力欠缺等问题，地方政府主动施策，推进产业链党建联建工作（中共德州市委组织部，2022；邓军，2023），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红色引擎”，初步探索出一条组织链、资源链、产业链、供需链、服务链多链融合及协同共进的新路径。

综上所述，产业链党建在推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当前研究和实践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乡村富民产业研究缺乏组织化视角，未能充分探讨产业链党组织如何有效嵌入并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二是产业链党建是因产业链发展而生的一个全新开放式议题，其在推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潜在价值与实际应用效果尚未引起学者广泛关注，亟待进一步挖掘与分析；三是关于产业链党建的理论研究稍显薄弱，尚未从组织化机制出发对其进行系统性探讨。因此，本研究深入探索产业链党建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中的组织化机制，运用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揭示产业链党建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强化产业协同和提升产业价值等途径推动乡村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产业链党建：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基本面向

在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路径探索中，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构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国模式”。产业链党建作为一种新型功能型党组织模式，在特定产业链上，打破传统按地域、单位设置党组织，而以产业链条为纽带，将链上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服务组织及相关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党员力量进行整合，建立功能性、枢纽型党组织。其核心目标在于，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引领和推动产业链延伸、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兴旺和农民共同富裕。具体而言，产业链党建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在产业链各环节建立党组织，形成“链主引领、多级联动”的“党建链”架构；二是在党组织协调下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资源，解决产业链发展中资金、技术、人才等瓶颈问题；三是提供政策宣讲、技术培训、市场对接等服务，组建党员服务队下沉一线，实行“问题清单”闭环管理，精准纾困；四是建立民主协商机制，平衡各主体利益分配，化解矛盾冲突；五是以党建品牌活动提升产业链影响力，推动产业链向电商、深加工等领域延伸，拓展跨界融合生态。产业链党建运行边界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主体覆盖层面，涵盖产业链上所有相关主体，包括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农户、合作社、科研机构等；功能聚焦层面，主要定位于政治引领、资源整合、利益协调和服务保障，具有非替代性，即不取代市场机制或政府的其他职能。

相较于企业党建、社区党建、学校党建等传统党建形态，产业链党建具有鲜明的功能导向与组织弹性。企业党建通常聚焦于单一企业内部的政治引领与职工动员，社区党建强调区域治理与服务居民，学校党建凸显以立德树人与教育教学为中心。产业链党建以产业链条为纽带，整合上下游多元主体，具有较强的跨组织性、功能性与协同性。其核心在于，以“党建链”串联“产业链”，实现党建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既不同于企业党建的内部化倾向，也区别于社区党建的地域化特征，更强调在动态变化的产业生态中发挥政治引领与资源整合作用。总体而言，相较于以上传统党建模式，产业链党建呈现出以下显著区别：一是在目标导向上，传统党建侧重政治引领和组织覆盖，而产业链党建强调直接服务产业发展，实现经济效能转化；二是在组织形态上，传统党建模式多按地域或单位设置，相比之下，产业链党建构建跨地域、跨行业“党建联盟”，形成更加柔性化、网络化的组织体系；三是在作用机制上，传统党建常以单向政策传达为主，产业链党建则重点推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解决资源分散、产业联动不足等实际问题。此外，产业链党建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与延展性，能够随产业链延伸而动态调整组织设置，这是其区别于其他类型党建的显著特征。

三、嵌入·吸纳·协商：产业链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一个分析框架

乡村产业发展，关键在于实现产业链重构升级。以往研究多聚焦于政府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着重探讨政府和社会的协同与合作，以期推动产业链关系的再平衡与优化。然而，政府与社会二元互动关系框架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情境下政党主体在推动产业链延伸和升级中的核心作用有所忽略，对现有产业链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解释力存在局限(郭台辉和徐凯东，2024)。国内有学者在将中西政治运行机制进行对比后，基于政党在中国政治与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将政党引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进行考量，并提出“政党—国家—社会”三分法(景跃进，2019)。基于此，本研究围绕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核心议题，立足中国政治实践，聚焦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领导力量，借鉴“政党—国家—社会”互动关系的分析视角，尝试构建“嵌入—吸纳—协商”的三维实践机制分析框架，旨在从政党引领驱动、国家资源赋能、社会协同共治三个相互关联、动态作用的实践维度，深入剖析产业链党建通过具体的组织化运作驱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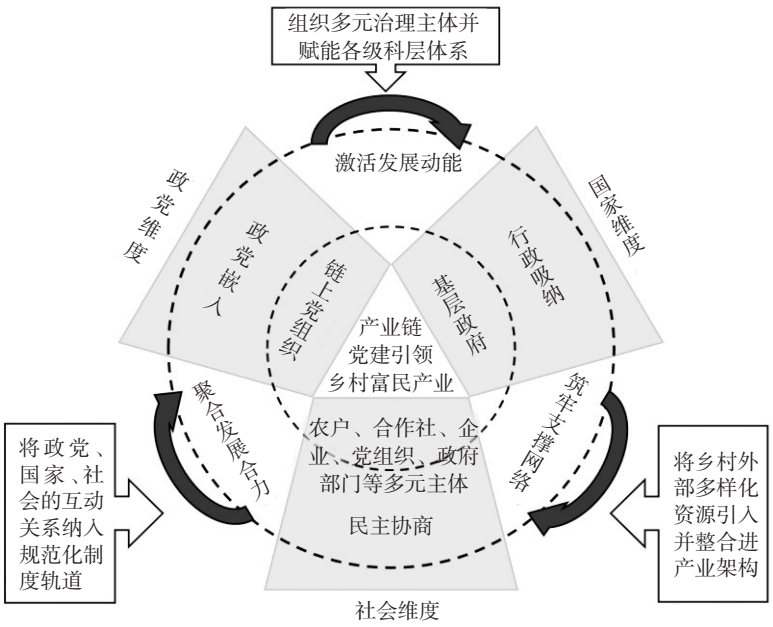


图1　产业链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分析框架

（一）政党基石：政党嵌入以激活产业发展动能

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实施，关键在于精准定位国家、乡村两个主体之间的实际契合点与共同关切(吴高辉和汪文新，2022)。在中国特色治理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其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强大的政治领导力，主动嵌入乡村产业发展进程。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看，政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其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政治与社会功能，扮演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主体角色。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党处于核心位置，发挥核心引领作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以政党为中轴构建，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也在政党的主导下有序进行。基于政党的这一核心属性，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组织化时，必须将政党纳入乡村治理的主体架构体系(陈文华和李海金，2023)。政党通过领导政府推行基层治理方案，并依托其在社会领域中的广泛组织基础，整合农民力量，共同促进产业发展。中国共产党嵌入乡村产业体系，核心目的在于强化基层组织和党员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最终达到重塑乡村权力架构的效果(刘双和余智勋，2023)。实质上，政党嵌入是党主动引领、发挥组织优势的综合治理机制，连接国家和社会两大主体，其成效体现在促进基层党组织与政府双重体制的互动与整合。基层党组织通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组织多元治理主体并赋能各级科层体系，确保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实现“横向到边”的广泛覆盖及“纵向到底”的深入贯通，从而使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核心主导力量。

（二）国家赋能：行政吸纳以筑牢产业支撑网络

马克斯·韦伯指出，科层制行政管理是现代国家的核心特征。在我国治理模式中，存在着“行政吸纳社会”现象，即国家凭借行政体系和手段，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居于主导地位的行政体系根据自身需求，为处于被动地位的社会力量制定行动准则(刘锐，2020)。行政吸纳社会模式是在社会自主权逐渐提升背景下，对行政控制机制进行适应性调整过程，目标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双重强化，建构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国式解释路径(于洁阳，2023)。本研究中，“行政”代表基层政府执行力；“社会”涵盖乡村社会地方习俗与本土力量；“吸纳”是指描述基层政府通过何种途径、在何种过程中与乡村社会在富民产业领域内相互作用的情形。在产业链党建实践中，“吸纳”体现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政府精准运用行政资源服务产业发展的机制。政党深入参与基层，为顺利推进

乡村产业振兴奠定坚实制度支撑。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过程中，基层党组织根据产业发展实际需求，在党建引领下精准施策，将乡村外部多样化资源有序引入并整合进产业架构，形成独特的多元化发展路径(吴业苗，2020)。在政党嵌入推动下的行政吸纳，要求党组织将党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深植于产业链各个环节，并转化为国家行动方针加以执行。在党的引领下，乡村社会和基层政府在功能上协同，利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实施行政吸纳，从而以党组织为引领，强化基层行政基础，推动政治建设，优化乡村富民产业发展模式。

（三）社会协同：民主协商以聚合产业发展合力

推进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基层民主协商的社会凝聚力、民主治理价值及政党与社会间互动逻辑愈发显著。面对当前多元化治理格局，民主协商是在党组织主导下，引导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的治理形式，是激活社会主体积极性，打破多元治理主体间制度障碍，促进向协商共治实现转型的有效举措。民主协商可以帮助政府汇聚民众意见，增强决策科学性和合理性，优化基层政权运作，有效应对体制内外治理张力及社会治理“碎片化”挑战(侣传振，2024)。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的核心在于，将政党、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纳入规范化制度轨道，并融入现代国家建构中，形成长期稳定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张等文和解秀丽，2023)，以此解决长期执政条件下可能产生的执政党与民众脱节问题，消除政党与民众间制度性隔阂。在党组织统筹协调下推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民主协商，需确保制度上的公开透明性，广泛吸纳政府部门、农户、合作社、产业链上相关企业以及党组织作为协商参与者，防止决策偏离公共利益和产业可持续发展轨道。协商过程中，必须充分保障各主体参与权利，使其可以完整表达意见，确保关于产业发展路径、技术支持需求等方面的建议和诉求顺畅传递。各主体的诉求应紧密结合乡村实际和产业特性，以保证协商进程的规范化、有序化和制度化。

四、产业链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组织化实践

J县位于甘肃省平凉市，多年来利用其地域优势发展苹果产业，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苹果产业链。在产业链发展过程中，当地政府逐渐认识到，要实现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为此，该县围绕苹果产业链，整合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合作社、相关服务组织、涉农政府部门的党组织和农户，成立苹果产业链党委，形成融合党组织建设与产业发展的模式。在这一产业发展模式中，党组织嵌入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构建“党建链”引领“产业链”发展，促进链上主体的紧密合作和信息共享；动员并整合多方资源，推动苹果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障链上各主体合法权益。这三个机制共同构成产业链党组织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中的领导力、组织力和回应力(见图2)。在产业链党委引领下，J县将苹果产业作为富民强县主导产业，实施产业链党建联建。截至2024年10月，全县苹果种植面积超过100万亩，人均果园面积达2.34亩，户均10亩，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180.9亿元，远销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当地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支柱产业①。

（一）党组织嵌入：构建“党建链”引领“产业链”

在中国治理情境中，作为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的绝对核心，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中有效领导政权建设，并依托其强大的社会组织力，推动政权和社会领域的融合和支持。党组织深度嵌入产业链，沿着产业链条织密建强组织链，形成“党建链”，以“党建链”引领“产业链”，让党建与产业发展政治同向、工作同力、发展同步，推动产业链补链、延链和强链，提升产业链的整体效能和竞争力，实现党建优势向产业发展优势转化。

① 数据来源：案例数据根据对J县产业链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的相关新闻报道和J县农业农村局提供的产业报告、统计资料及项目调研数据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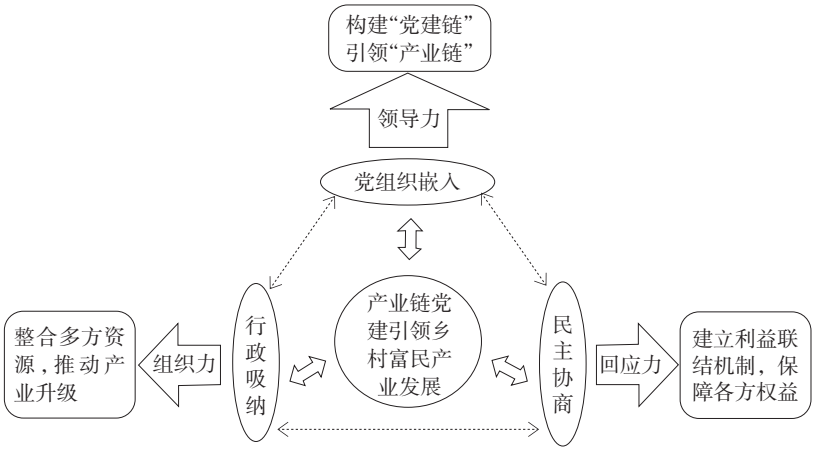


图2　J县产业链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运行机制

1.组织建在链上：党建联盟促进协同发展

党建联盟构建起一种超企业边界的组织协同架构，该架构以党的组织体系为核心，将产业链上下游各企业党组织紧密串联起来。在推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进程中，J县创新性构建“党建链”，成立产业发展功能性党总支，使基层党组织工作渗透到苹果产业发展各个环节。构建并完善“1+8+N”模式的党建联合体系，即以产业链主导部门党委为引领，组建技术研发、加工转化、果旅融合、包装配套、农资服务、金融支持、贮藏营销、电商物流8个“链主”企业党支部作为“领头雁”带动其他企业，覆盖带动产业链上下游20家企业抱团发展。截至2024年，链上共有党员198名，择优选派党建指导员8名驻企进行联络服务。建立《产业链委员会议事规则》《委员职责分工》《党建重点任务清单》等制度文件，形成权责法定、透明、协调、制衡的运行保障机制，确保党建共抓、政策共研、资源共济、信息共享、生产共促的融合格局。

2.服务沉在链上：精准服务解决实际需求

产业链上具有众多企业类型和多元利益主体，其需求呈现高度差异化、动态化特征。党组织将服务深植于产业链条中，精准定位并满足产业链各主体需求，构建全方位、多层次需求感知与服务供给体系。J县党委在推动“党建链”引领“产业链”过程中，一方面，建立“红色领航帮办团”，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截至2024年，当地采用政策宣讲会、排忧解难会、协调推进会、一线“问诊”等形式，摸排企业发展难题71件，帮助产业链企业解决实际问题13件，协调金融机构发放信贷资金13.94亿元，推动链上企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构建政策理论共同学习、党建活动联合举办、重大事务共同商议、资源信息互通共享、产业发展互利共赢的协同推进机制，确保产业链各环节供需紧密衔接，为苹果产业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和全过程支持。

3.资源聚在链上：协调整合推动资源共享

产业链内部蕴含政策、技术、人才、资金、项目和土地等多种资源要素，但由于企业间的竞争关系和信息壁垒，部分资源处于分散、低效利用状态。J县苹果产业链上党组织构建资源整合平台和共享机制，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资源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一是聚焦企业共性及个性需求，从政策需求侧、供给侧双向发力，建立并动态更新企业需求、资源、政策和项目“四张清单”，梳理产业链上企业的资源需求和优势资源，实现资源的精准匹配和高效利用。二是建成并运营果品分选线、电商物流园、果业智慧技术服务平台等，引进果袋加工生产线6条，基本建成J县苹果电商公共服务中

心，实现资源共享良性循环。三是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产业链建设深度融合。为降低自然灾害对苹果生产的影响，2024年初当地县委县政府和苹果产业链党委为链上企业园区安装大型防霜机24台、暖风式防霜机90台，配置果园增温炉2 000个以及花粉和防冻药剂等一系列现代化防灾减灾物资。

4.作用融在链上：先锋模范带动合作交流

充分利用先锋模范力量带动产业链上各企业间合作交流与文化融合，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J县在构建“党建链”过程中，一是注重发挥党员标杆引领作用。一方面，在24个乡镇设立果业技术服务站点，汇聚农技推广区域站的人力资源，推行“南北结对”党员帮扶机制；另一方面，建立党员志愿服务队、产业链党员示范岗、党员红旗手示范基地，将党员先锋作用融入产业链发展关键环节。二是注重发挥党组织桥梁和纽带作用。不定期召开产业链党建联建会议、联席会议，搭建银企对接、结对帮扶、技术共享“三大平台”，加强交流合作，共同应对市场风险和挑战。三是注重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充分发挥“链主”企业在技术标准、市场渠道和管理经验上的引领与示范效应，实现共享技术规程、统一采购生产资料、共建销售平台等，带动产业链上中小企业和合作社“抱团”发展，降低整体运营成本，提升产业协同效率和抗风险能力，形成“头雁引领、群雁齐飞”的产业生态。

（二）行政吸纳：整合多方资源，推动产业升级

在产业链党建格局下，“行政吸纳”具有党建引领特性与甄别性，即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引领政府在“吸纳对象”“吸纳内容”和“吸纳时序”上进行选择，使其贴合党建目标和产业发展需求，并依据不同阶段政策导向，对同一对象实施差异化、动态化资源吸纳（刘锐，2020）。政府主导行政吸纳，整合财政、金融、技术、人才等多元资源，为产业链发展筑牢根基。在党组织的统筹协调下，行政吸纳机制与党建工作实现紧密融合、同频共振，推动乡村产业升级。

1.以党建引领制定扶持政策，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通过深入调研与民主协商，政府精准识别产业链各环节的差异化政策需求“定向施策”，实现行政资源对产业发展的精准吸纳。金融政策方面，主动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并建立“白名单”制度，将党建强、发展好、信用佳的链上企业推荐给金融机构，运用贴息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等金融工具，化解融资困境。财政支持方面，政府引导资源聚焦“链主”企业“关键主体”，扶持链上20家“链主”企业错位发展，论证实施多功能苹果精深加工、智能分选生产线等重点项目35项（共17.12亿元），争取国家产业集群项目中央资金1 100万元。税收优惠方面，针对契合党建导向、推动产业发展的链上企业，实施增值税减免、所得税优惠等政策，降低企业税负。J县政府在产业链党委的建议与推动下，已出台22项包括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方面扶持政策。

2.借党建之力搭建服务平台，促进资源高效配置

政府依托产业链党委的组织网络与公信力，构建起资源汇聚与配置的枢纽平台，吸附并撬动市场与社会资源向产业链集聚。借助平台协同联动，实现资源在产业链上精准“投放”。一方面，牵头搭建果业智慧技术服务平台、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等实体枢纽，将党建服务触角延伸至产业链各环节，为企业、农户提供信息查询、技术咨询、市场营销、物流配送等一站式服务，以党建促协同，提升产业链整体运行效率。在此基础上，推动电商物流园与苹果产业链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苹果产品精准营销和个性化定制，拓宽苹果产业销售渠道和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在产学研合作上，政府基于对产业技术短板的研判，为链上企业带来科研资源，成功与甘肃农业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产学研基地，并成功联合申报全省科技重大专项，获得200万元资金支持。

3.靠党建统筹推动产业集聚，强化链条协同效应

从产业布局规划来看，在党组织引领下，政府科学划定产业集聚区域，引导并主动吸纳相关企

业、合作社、农户等产业主体向特定区域集中。在集聚区内，围绕主导产业“磁极”，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入驻，形成完整产业链条。一方面，加强产业规划和布局，围绕“一基地六中心”建设和打造百亿级产业集群目标，推动相关产业在特定区域内集聚发展。2024年新建J县苹果产业链重点建设项目35项，建成育苗基地2 000亩，累计完成老果园更新改造2万亩、技术改造5万亩，建设标准化果园80万亩。另一方面，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交流，构筑完整产业生态。党组织牵头引进10家“链主”企业，加速推进延链、强链项目，建成10万吨农林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确保全县果品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链实现从原料供应、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过程协同和高效运作，实现产业链整体跃升。

（三）民主协商：建立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各方权益

民主协商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题中之义。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实践场域中，涉及农户、企业、合作社、村集体等多元主体，各方在资源投入、收益分配、风险承担等方面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依托民主协商机制，各主体积极参与决策过程，共同商讨产业发展规划、利益分配等问题，进而使各主体在产业发展中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吴永江和李志，2024）。党组织具有坚实的制度根基，确保民主协商机制在多元主体复杂的利益博弈格局中，在精准聚焦问题后高效达成共识，保障产业发展的稳定性。

1. 构建多元共治体系，实现多方参与机制

多元共治理论认为，治理主体应具有多元性，各主体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同时密切合作，形成一个互为补充、相互关联的有机体。J县在苹果产业发展中，党组织发挥枢纽性引领作用，将政府部门、企业、合作社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纳入统一产业发展框架，并通过制度化“事务共商”机制促进各方参与，目前累计开展相关协商活动15场。政府部门在党组织引领下，基于公共管理职能定位，在政策制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监管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保障产业发展基础环境。企业依托产业链党建搭建协同平台，遵循市场逐利、产业增值逻辑，激活资金、技术、市场渠道等优势要素，参与果园标准化建设、果品深加工、销售拓展。合作社作为果农的利益代表，组织果农进行统一生产管理、技术培训、农资采购，保护果农基础收益。社会组织如农业技术协会等，发挥技术和信息专长，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咨询、市场动态反馈，填补产业技术和信息鸿沟。

2. 推行利益联结模式，强化利益联结机制

利益联结机制的外在表现是利益联结模式，不同的利益联结模式形成不同的利益联结机制。就乡村产业复杂利益格局而言，存在着多种平衡各方利益、促进协同发展的利益联结模式。一是订单农业模式。链上企业与果农签订收购订单，明确苹果质量标准、收购价格和数量等要素，确保果农有稳定销售渠道，保障企业原料质量和供应。在此过程中，党组织全程监督契约执行过程，强化履约保障机制，维护交易秩序。二是股份合作模式。J县苹果产业链党委依据产业发展阶段需求和公平分配原则，引导企业与果农突破传统产权边界，推动果农以土地、果树等“沉睡资产”入股企业，参与利润分配。党组织在该模式下扮演利益平衡者和规则制定者角色，保障果农从生产者转变为产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三是劳务合作模式。在苹果采摘季节，J县党组织基于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统筹组织果农参与产业短期用工需求环节，为企业解决季节性用工紧张难题的同时，为果农提供临时性增收路径，提升农户收入水平。

3. 健全矛盾调解平台，完善矛盾调解机制

在乡村富民产业动态发展过程中，由于利益诉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类矛盾纠纷。党组织在此情境下扮演关键纠纷化解角色，为产业矛盾调解提供组织依托。J县立足本地产业实际，借助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矛盾调解网络架构。县级层面，党

组织牵头组建苹果产业矛盾调解中心，聚焦解决重大、复杂产业矛盾纠纷。在此过程中，党组织牢牢掌控调解“方向盘”，保障调解结果符合产业发展整体利益与社会公序良俗。乡镇层面，党组织安排成立苹果产业矛盾调解工作室，选派熟悉乡情民意的乡镇干部、司法所工作人员、当地有威望的果农代表组成调解队伍，及时、有效化解乡镇范围内一般性矛盾。村级层面，党组织激发村“两委”成员与村民代表自治积极性，成立矛盾调解小组，利用地缘、血缘优势，化解日常矛盾纠纷。

五、产业链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组织化机制

协同治理理论注重多元主体协同合作、资源整合共享以及系统协同效应的达成以实现共同目标。基于实践观察与分析，本研究提炼出“组织嵌入—组织吸纳—组织协商”三位一体组织化机制框架。在该框架中，组织嵌入机制构建连接产业各环节的“融合桥”，打破主体隔阂；组织吸纳机制打造汇聚多方力量的“赋能站”，优化要素配置为产业链主体提供物质、人力、信息等支持；组织协商机制编织捆绑多元主体利益的“联结链”，激发内生动力（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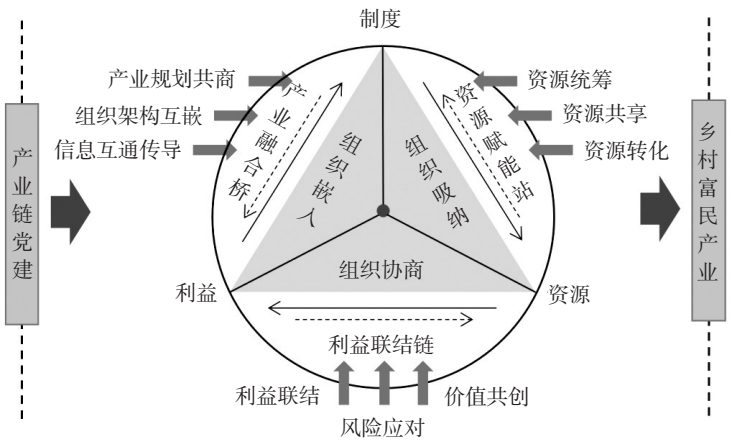


图3 产业链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组织化机制

（一）组织嵌入机制：搭建联结上下游的“产业融合桥”

基层党组织作为核心引领力量，为打破产业上下游隔阂，实现各主体在产业规划、生产经营、市场拓展等方面协同合作，超越传统地域和单位限制，在关键环节和主体内部灵活设置功能性党组织，采取交叉任职、联席会议等方式，与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建立紧密的组织联系。向外，党组织广辟资源引入路径，精准对接政府扶持政策、科研成果及社会资本，合理分配至产业链薄弱与关键处。对内，推动企业技术交流共享，挖掘培育本土产业人才。

1. 产业规划共商：指引产业发展路径

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中，产业规划共商机制基于党组织政治引领力与广泛组织网络，主导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产业发展规划协商平台。党委组织召开产业发展研讨会、座谈会，各主体充分交流市场信息、行业趋势，共同参与产业规划制定。在此过程中，党组织扮演议程设定者和共识凝聚者角色。各主体充分交流意见，权衡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个体诉求与整体效益的关系，基于本地资源禀赋、市场需求、长远发展目标，最终形成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可行性的产业发展规划，从而实现上游供应与生产依循下游加工、销售及市场拓展需求精准调适，下游则向上游反馈技术、信息、资金支持。此外，党组织建立规划实施跟踪评估机制与动态调整机制，定期对规划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及时调整优化规划内容，确保产业发展路径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2. 组织架构互嵌：筑牢产业组织保障

为适应产业链延伸升级需要，党组织根据产业发展需求，灵活调整组织架构，深入渗透到产业链各个环节，在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内部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推动各主体间组织交叉任职与互动交流，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覆盖网络。纵向上，按照产业链不同环节，从原材料供应、生产加工、产品销售到售后服务等，建立层级分明、衔接紧密的党组织架构。上级党组织统筹规划产业发展战略和党建工作方向，下级党组织则将战略部署细化落实到具体生产经营环节中，确保党的领导贯穿产业链始终。横向上，推动产业链上不同主体党组织之间交叉任职与互动合作。企业党组织与农民合作社党组织之间互派党员骨干挂职交流，促进企业市场经营理念与合作社生产组织经验相互融合。

3. 信息互通传导：加速产业运转节奏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信息的快速传递和共享对于提升产业链运转效率、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产业链党建框架下，党组织充分发挥其政治枢纽和组织网络优势，构建信息收集、整合、传导机制，成为加速产业链信息流运转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党组织系统梳理并及时传递各级政府出台的产业政策、补贴信息、项目申报指南等，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链上主体。另一方面，利用党建联建平台主动收集、甄别并整合市场供需动态、价格波动、技术前沿、行业预警等关键信息，在链上主体间高效传导，破解“信息孤岛”和不对称问题。党组织在传递信息的同时，主动建立信息研判和反馈闭环，将基层诉求和市场信号及时向上反馈，为政策优化和产业决策提供依据。

（二）组织吸纳机制：打造汇聚各方力量的“资源赋能站”

基层党组织依靠自身组织网络与政治优势，吸引外部资源流入乡村产业，促进内部资源优化、整合与共享。具体而言，党组织能够穿透市场壁垒和行政条块分割，灵活建立需求与资源匹配机制，搭建协同服务平台，引导政策与项目精准投放，更好实现资源要素在产业链上高效流动。一是发挥政治引领作用，争取产业扶持政策、资金补贴等资源，引导其投向产业链薄弱环节；二是发挥组织协调优势，加强企业与科研机构协作，引入先进技术与人才资源，提升乡村产业科技含量和创新能力；三是发挥桥梁纽带功能，推动农民合作社之间的经验交流、资源共享，提高合作社运营管理水平。

1. 资源统筹：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业协同效率

党组织作为核心领导与统筹主体，凭借其宏观调控与协调能力，系统梳理与评估乡村内部土地、劳动力、特色农产品等核心资源禀赋。在此基础上，将视野拓展至乡村外部，整合政府专项产业扶持资金流向、科研机构可转化技术成果以及社会资本投资意向等关键信息。基于所掌握内外资源禀赋和发展需求，对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进行统筹规划。人力资源方面，整合并科学调配分散的农业劳动力、农村电商人才、乡村旅游服务人员，提升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物力资源方面，统一登记土地、农业设施、乡村闲置房产等资源，引导其向优势产业项目倾斜。财力资源方面，整合政府扶持、社会投资以及村集体积累等资金，建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池，实施精准化、项目化投放管理。

2. 资源共享：拓宽资源来源，增强产业多元支撑

资源共享旨在破除主体间资源壁垒，依托产业链党建平台，促进信息、技术、资金、人才等多维度资源有效汇聚和高效共享。在党组织引领下，资源共享机制凸显出以下特征：一是资源来源的多元化。党委强化组织联动，有效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农户等多方主体资源，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拓宽国内外市场资源接入渠道。二是资源利用的协同性。在资源共享机制下，各类资源不再孤立存在，而是借助产业链党建平台实现其在不同主体间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三是资源支撑的多维度。在注重物质资源整合的同时，党委着力构建学习共同体、知识交流平台，促进产业链内外知识溢出、技能传递、信息共享，为乡村富民产业发展注入内生动力与智力资本。

3. 资源转化：提升资源价值，促进产业创新升级

传统农业资源转化方面，党组织引导企业采取深加工、品牌化的方式提升初级农产品附加值，延长产业链条。在技术资源转化上，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联合开展技术研发与创新应用，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提高农产品产量与质量。在人力资源转化上，协同高校与职业培训机构开展定制化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与创业人才，实现农民向专业化经营主体转型。在文化资源转化上，推动文化资源与农业产业深入融合，挖掘乡村特色文化价值，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经济收入，驱动产业多元化升级，使乡村富民产业在资源价值不断提升与转化的过程中，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的跨越式发展，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组织协商机制：编织串联多主体的“利益联结链”

基层党组织在产业发展中扮演规则制定者、过程主持者和利益平衡者角色，建立公平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增强产业链各主体之间吸引力和凝聚力。其核心在于化解潜在冲突、凝聚发展共识、激发主体活力，将分散的个体利益诉求纳入公共决策轨道，形成基于共识的行动方案。党组织履行监督与协调职能，确保利益分配公平公正，避免利益冲突。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表彰激励制度，激发各主体持续投入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不断优化产业生态与合作关系，确保乡村富民产业系统协同效应最大化。

1. 利益联结：以合理分配激发产业主体活力

利益联结机制的核心在于构建科学、公平、稳定的分配框架，注重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建立合理且可行的利益分配机制。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过程中，党委基于各产业主体在产业链中的角色定位、资源投入及风险承担程度，准确把握政策导向与市场动态，设计并实施差异化利益分配方案。党组织依据主体定位，明晰差异化利益联结路径：一是农业企业凭借资金投入、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优势，在利益分配中侧重于获取与投资回报、市场风险补偿相匹配的利润份额；二是农民合作社依据组织生产、提供服务及集中销售等贡献，获取相应服务费用与增值收益分成；三是农户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按照土地流转租金、劳动报酬以及基于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产生的绩效奖励等多种形式参与利益分配。

2. 风险应对：凭协作御险稳固产业发展态势

在产业链党组织引领下建立的风险应对机制，强调主体协作与联动，共同抵御市场风险、自然灾害等。在风险发生时，党组织迅速发挥核心协调和组织作用，动员各主体依据其资源优势、风险承受能力参与应对。依托信息共享、资源调配、技术支持等，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对产业发展的冲击，确保险情响应高效、处置有力，保障产业链稳定运行。风险应对机制有效运行的基础是党组织统筹下共同构建的风险评估和预警体系。各主体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共同参与风险的识别、评估工作，根据产业链特性、各环节脆弱性，确定风险优先级与潜在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设定相应预警指标和阈值，当风险指标触及预警线时迅速启动协同应对预案，紧密协作降低损失，维护产业发展平稳态势。

3. 价值共创：借众智协同拓宽产业增值维度

“价值共创”概念起源于营销领域，主张整合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双方资源，共同实现服务价值创造，以提升个体及社会福祉水平。然而，在产业链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过程中，价值共创机制聚焦于整合产业链各主体的智慧和创造力，共同探索新的价值增长点，拓宽产业增值空间，实现产业价值最大化。党组织作为引领者和推动者，充分发挥党建平台作用，鼓励包括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以及地方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探索新技术、新工艺、新业态的应用，驱动技术创新、产品迭代、服务升级。在党组织协调下，各主体超越传统合作模式中的零和博弈，转而追求互利共赢的共生发展，将创新元素深度融入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品牌建设等全链条环节，实现乡村富民产业价值多元拓展。

六、结论与讨论

将产业链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组织化机制转化为实际效能，是推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因地域特色、市场导向及产业链条的多样性，乡村富民产业组织化机制的构建与优化过程尤为复杂且关键。产业链党建根植于中国本土治理实践，将党组织的聚合力与产业链优势融合，形成“党建引领、产业联动”的发展共同体，契合新时代乡村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本研究依据“政党—国家—社会”的三元互动范式，在分析党建引领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央顶层设计和地方实践创新构建“嵌入—吸纳—协商”三维实践机制分析框架。通过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深入阐述产业链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中的组织网络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及互动机制。从组织化机制视角来看，产业链党委在组织嵌入机制运行下搭建“产业融合桥”，与各主体构建紧密的组织网络以打破产业隔阂；借助组织吸纳机制打造“资源赋能站”，吸引外部资源流入乡村产业，促进内部资源的整合与共享；依托组织协商机制编织“利益联结链”，协调各方利益，激发各主体积极性、主动性。

深入剖析J县实践，提炼出当地产业链党建引领苹果产业发展的核心特征：一是创新构建“1+8+N”产业链党建联合体系，实现“组织链”“产业链”深度耦合；二是形成“政党嵌入激活动能、行政吸纳整合资源、民主协商保障权益”三位一体协同治理闭环；三是发挥“链主引领、多级联动”优势，精准整合配置多元资源。其成功经验在于，精准施策解决痛点、创新多元利益联结模式、强化科技赋能和风险共担。J县这一实践为解决乡村富民产业“资源分散、联动不足、合作不紧”等共性问题提供可资推广的组织化方案，为党建引领产业振兴、区域特色产业升级提供示范路径。为更好推动产业链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基于J县经验启示及全国视野，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国家层面应加强顶层设计，出台产业链党建标准化指南，完善考核激励与政策资源整合机制；二是地方层面需因地制宜优化组织设置模式，提升党组织服务产业能力，深化“链主”企业培育带动作用；三是促进跨区域产业链党建协作与人才技术流动，建立东西部地区资源互补、市场对接长效机制，畅通柔性引才渠道；四是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建设“智慧链上党建”平台，提升运行效率。

准确理解产业链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这一议题，需要对其全面系统把握，未来对于该议题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深化：第一，产业链党建模式的提炼与总结。鉴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及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探索适应各地特色的产业链党建模式，如紧密型、松散型或混合型等，并总结其成功机制、适用条件、推广路径。第二，产业链党建理论的拓展与创新。当前，面对产业链这一新兴组织载体，传统党建理论亟须与时俱进，探索产业链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动力机制，从学理层面构建产业链党建的理论体系，填补该领域现有理论空白。第三，产业链党建引领乡村富民产业发展的实践困境研究。尽管产业链党建在推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仍面临党员分布不均、党组织覆盖率不高以及未能跳出属地化、区域化党建的传统思维、阵地建设亟待加强等挑战，需要深入研究这些实践困境的具体表现及其成因，并提出针对性解决策略。

参考文献

[1] 王国峰, 邓祥征. 乡村振兴与发展中的产业富民: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0, 41(6): 910−918.

[2] 黄少容, 林革. 基于共同富裕的广西县域富民产业发展研究[J]. 广西社会科学, 2024(2): 146−153.

[3] 庄天慧, 邱峰, 杨浩. 县域富民产业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作用机理、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J]. 改革, 2024(3): 127−141.

[4] 刘明月, 冯晓龙, 冷淦潇, 等. 从产业扶贫到产业兴旺: 制约因素与模式选择[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10): 51−63.

[5] 胡高强, 孙菲. 新时代乡村产业富民的理论内涵、现实困境及应对路径[J]. 山东社会科学, 2021(9): 93−99.

[6] 曹斌. 乡村振兴的日本实践: 背景、措施与启示[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8): 117-129.
[7] 王惠林, 张卫国. 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组织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基于山东省招远市D村的实证调查[J]. 求实, 2023(6): 92-106+110.
[8] 张雨薇. 党建引领产业振兴: 分层治理视野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23, 44(6): 66-75.
[9] 曾薇. 在地化调适: 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创新[J]. 中国农村观察, 2023(6): 103-123.
[10] 杨学成, 梁玉春. 乡村振兴视野下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基础、制约因素与制度供给[J]. 湖北社会科学, 2023(4): 87-93.
[11] 肖卫东. 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行动路径[J]. 理论学刊, 2023(1): 117-126.
[12] 王春光, 单丽卿. 农村产业发展中的"小农境地"与国家困局——基于西部某贫困村产业扶贫实践的社会学分析[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5(3): 38-47.
[13] 何得桂, 刘翀. 党建势能: 基层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机制——以陕西H县党建"三联"促发展为例[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22, 24(2): 12-23.
[14] 魏飞. 党建引领推动"四链"深度融合的南山实践[J]. 人民论坛, 2023(23): 98-101.
[15] 高雪莲. 党建引领为基础的互构式农业组织化研究——张掖市柳新区党组织助力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案例分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3(3): 34-42.
[16] 中共德州市委组织部. 山东德州: 实施"红链赋能"工程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J]. 党建, 2022(6): 64-65.
[17] 邓军. 创新体制机制集聚资源优势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产业链发展[J]. 人民论坛, 2023(23): 50-51.
[18] 郭台辉, 徐凯东. 政党调适与国家治理——基于发展党员两组数据的走势分析[J]. 理论与改革, 2024(1): 58-71.
[19] 景跃进. 将政党带进来——国家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反思与重构[J]. 探索与争鸣, 2019(8): 85-100+198.
[20] 吴高辉, 汪文新. 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与理论构建[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22(2): 66-75+126.
[21] 陈文华, 李海金. 政党统领社会: 新时代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化逻辑[J]. 理论月刊, 2023(1): 5-14.
[22] 刘双, 余智勍. 耦合视角下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共治的逻辑、张力和路径[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2): 131-138.
[23] 刘锐. 行政吸纳社会: 基层治理困境分析——以H市农村调查为例[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6(3): 135-143.
[24] 于洁阳. 行政吸纳社会: 过渡型乡村人民调解实践及其功能困境分析——以苏南A村为例[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4(5): 83-94.
[25] 吴业苗. 行政化抑或行政吸纳: 民生服务下政府参与村级治理策略[J]. 江苏社会科学, 2020(4): 69-78, 243.
[26] 侣传振. 嵌入式治理: 协商民主推进乡村治理有效的内在机理——以浙南H村"百家合议会"实践为例[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5(2): 38-48.
[27] 张等文, 解秀丽. 基层协商民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机理与优化路径[J]. 学习与探索, 2023(7): 46-54.
[28] 吴永江, 李志. 以协商民主促进乡村治理可持续创新的强化机制与实践进路[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45(4): 190-199.
[29] Evans P. Embedded autonom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30] Marshall R. Rural policy in the new century[J]. 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 2001, 24(1): 59-83.

（责任编辑：徐　源）

Research on the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Chain Party Building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nrichment Industry

HU Weiwei[1], LIU Pan[1], ZHAO Minjuan[2]

(1.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Shaanxi,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Shaanxi,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the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traditional way of leading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has been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urrent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party building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is a new type of functional party organization that connects the "resource chain", "supply and demand chain", "service chain" through "organization chain", builds an integrated and linkage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system, and promotes the deep integration, mutual integra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of party building work and industrial chain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tripartite interaction paradigm of "party-state-society", based o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innovation of local practi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tripartite analysis framework of "embedding-absorption-consultation". On this basis, the case analysis method is adopted.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and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chain party building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nrichment industry is deeply analyzed, which is manifested as: party organization embedding to build a "party building chain" to lead the "industrial chain", 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to integrate multiple resources,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to establish a mechanism for linking interests, and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Finally, taki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nrichment industry from three aspects: organizational embedding to build a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bridge" that connects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organizational absorption to build a "resource empowerment station" that gathers the forces of all parties, and organizing consultation to weave a "interest connection chain" that connects multiple subjects.

Key words: industrial chain party building; party building leading; rural enrichment industry; rural industry revitalization